

峥 嵘 岁 月

烽火关山

战争年代纪事

王政柱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峥嵘岁月 ·

烽 火 关 山

——战争年代记事

王政柱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烽火关山：战争年代记事/王政柱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9

(峥嵘岁月)

ISBN 7-5035-2058-2

I. 烽… II. 王… III. 革命回忆录 - 中国 IV. 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0174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8.125

字数：468 千字

定价：51.00 元

前　　言

本书根据我个人积累的部分材料，结合后来参加编写战史接触的部分史料编写而成，内容涉及战略转移、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四部分。作为关心历史，了解历史的人们提供一点参考。由于掌握情况的局限性，解放战争时期除我所在的第一野战军外，其他野战军粗略的提到。请原谅。

写文章，特别是回忆之类，最重要的一条是掌握真实有据的确凿材料。战争动荡的年代，要保存一点珍贵资料是非常困难的，要冒很多风险。1942年侵华日军发动的对太行五月大“扫荡”；1943年3月组织上调我到延安学习，单独化装便衣历时一个半月闯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就是例子。后来环境逐渐趋向稳定，利用工作之余，对一些严重破损和字迹模糊的材料进行修修补补，盼望有整理的机会。万万没有料到，全国解放后出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我像许多被迫害的人一样，人被关，家被抄，扫地出门，关押四年，个人保存的文物在湛江、北京两次被抄。他们想要从抄走的文物中找到攻击我的“罪证”，找不到就无中生有地捏造为“彭黄分子”、“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等，完完全全是政治陷害。

1980年军委分配我到总后勤部工作，直到1985年组织上决定我离休前，才给我平反。

离休后我参加编写战史工作，为了个人写点回忆，又一点一滴的重新搜集材料。

1997年我辞退战史任务，投入此书编写工作，除请人帮助打印外，由自己执笔，饱尝了写书之艰难。因文化和政治水平低，内容难免有错，欢迎批评指正。

王政柱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

目 录

☆红军主力转移和长征.....	(1)
☆抗日战争时期.....	(65)
☆解放战争时期.....	(343)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505)

红军主力转移和长征

(1932—1936 年)

1931年，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撤至山海关内。下面是蒋介石1931年9月16日由南京发给驻北平的张学良的密电（“铣电”）：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民民族于不顾。”1935年6月《何梅协定》出卖华北大部分主权。

1932年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口号下，集中兵力向共产党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积极进行“围剿”。从1932年起，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和我们自己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先后进行战略转移，有的奉命转移。除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转移，和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转移到黔东外，其他转移都称为长征。

一、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区战略转移 到川陕边（1932年10月—12月）

[1932年]

5月 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总部设在武汉）。国民党整个战略计划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区，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达到各个击破红军之目的。共分为三路。除何成浚指挥的左路对湘鄂西区外，中右两路全力围攻鄂豫皖区，中路司令部设在信阳（后移广水），蒋介石兼中路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辖张钫、陈继承、马鸿逵、张印相、上官云相、卫立煌六个纵队和总预备队（指挥官钱大钧）。共17个师另3个旅。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六安，李济深兼任司令官，王均为副司令官，辖徐庭瑶、王均（兼）、梁冠英三个纵队，总预备队指挥官阮肇昌，共7个师另1个旅。中右两路

合计 24 个师，另 6 个旅，30 余万人。

第四次反“围剿”前，红军发展比前较顺利，打了几个胜仗，发展成二万正规红军。张国焘等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主张“不停顿的进攻”，不进行反围攻的动员准备，这是导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当敌人积极部署，准备“围剿”时，令方面军主力四个师围攻麻城威胁武汉，当敌人大举围攻时，仓促应战，死打硬拼，打了几仗，顶不住，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十一师政治委员甘济时牺牲。张国焘由盲目轻敌狂妄自大变为惊慌失措。9月13日、24日张国焘向党中央告急，要求“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张国焘：

“（一）此次敌集结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虽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兼以坚守据点，稳扎稳打。

（二）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力量，而不宜死守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三）这三次战斗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红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四）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的两次胜利，这是一方面军北向发展的胜利的开始，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湘鄂西应在打击敌人一方的便利条件下，以一部分兵力向京汉路西行动”。

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红安以西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要红军向外线转移，徐向前等多数同

志认为前几仗未打好，敌人重兵云集根据地内，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同意转移外线作战，待机再回根据地。会后，中央分局和方面军总部，率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共13个团，2万余人，12日于京汉路广水、卫家店之间通过铁路向西转移。尾我追击的第十师、八十三师和第一师、四十四师、六十七师企图歼灭红军主力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

10月19日 方面军主力进到枣阳以南新集地区，原拟在此休整后，反击敌人，待机打回根据地。

10月19—22日 方面军与合围之敌在枣阳新集、土桥地区展开激烈战斗，毙伤敌3000余人，缴获山炮、迫击炮5门、机枪30余挺、步枪1000余支，我伤亡1000余人，三十二团长林维权，三十三团长吴云山牺牲。将少共国际团解散补充到各师。方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被迫寻求新的立足点。

11月初 方面军进至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休息三天，准备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敌人跟踪赶来，我向漫川关进，除漫川关驻有陕军三个团外，胡宗南第一师的两个旅从郧县赶到，北面有冯钦哉四十二师向南压，我军陷入悬崖峭壁峡谷之中，情况危急。张国焘曾准备让部队分散突围。徐向前指挥亲自选择突破口，用火力打开一条通路，突出险境，打破敌人的围歼企图。

11月19日 方面军进到商县西之杨家斜，将鄂豫皖革命军委员会改称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11月24日 方面军于西安南40里王曲歼陕军混成旅四个营。27日于鄂（户）县南之彷徨镇与拦截之敌胡宗南部两个旅和六十五师、十七师、四十二师激战通宵，歼陕军一个警备旅，我第十师代师长曹光南在战斗中牺牲。

11月27日 收到党中央电报，要四方面军“在鄂豫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继续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要“迅速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与行动的呼应”，“帮助领导恢复鄂豫边苏区”，“红军主力整理休息补充之后，应取向回发展的方向，造成

时时威胁襄樊及武汉形势”。鉴于方面军在敌紧追下，已远离鄂豫边，深入陕境，张国焘决定方面军南进汉中。

11月29日 方面军由新口子出发，再次翻越秦岭，此时已届寒冬，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白天行进在丛山峻岭，夜宿人烟稀少的老林，克服饥寒之苦，经过九天行军于12月7日进至秦岭南麓的小河口。

一部分高级干部（余笃三、王振华、朱光等）商议对张国焘为什么放弃根据地，方面军究竟要到哪里去，不作动员解释不满意，并到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张琴秋，刘杞推举曾中生书面向张国焘陈述大家意见，并转中央。

12月18日 张国焘在小河口召集部分师以上干部开讨论行动方针，会上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随后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事后张国焘得知上述反对他的行动便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

12月10日夜 方面军徒步过汉水进到城固南之上元观地区，摆脱了西进以来的被动局面，保存了15000人的骨干。

12月15日 方面军在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了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决定立即翻越巴山，首先夺取通江、南江、巴中地区。12月17日开始出发，一举占领通江（12月25日），巴中（1933年1月23日），南江（1933年2月1日）。红军在地方党组织协助下，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3年]

2月7日 在各县、区党组织的基础上，于通江召开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组成川省委，袁克服为省委书记，成立省苏维

埃政府，扩大红军、壮大武装力量，粉碎敌人围攻。2月至6月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7月 方面军由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红十师扩编为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辖十、十一、十二师；红十二师扩编为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辖二十五、二十七师；红十一师扩编为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辖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红七十三师扩编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辖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川陕军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副主任傅钟、曾传六。方面军直属机关和部队有参谋处，总经理部（后勤），总医院和警卫一、二团。彭杨学校直属军委领导，整个方面军共4万余人。

同月 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统率各派军阀对红军发动新的围攻。方面军乘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观望，围攻尚未准备就绪之际，于8至10月向敌人发动仪（陇）南、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战役，占领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宣达战役中得到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配合，与游击队（万余人）会师后，编为红三十三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近7万人。

9月 刘湘击败刘文辉，结束四川军阀混战，形成以刘湘为首的形式上的统一。10月4日刘湘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以其所属第二十一军（潘文华）为其主力，纠集四川军阀，于10月6日下达对川陕根据地六路围攻的动员令，方面军以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疲劳消耗敌人，为反击创造有利条件，达到最后粉碎敌人的围攻计划。战斗时间持续之长（10个月），敌人兵力之大（140多个团）是空前的。在人民大力支援、各个战线上有力配合下，终于1934年8月粉碎了敌人的围攻。胜利是

巨大的。毙伤敌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缴获枪3万余支，炮100余门。不仅恢复了宣达战役后的根据地，而且扩大了部分新区。方而军锻炼得更加坚强，鼓舞了人民斗争胜利信心。8月23日刘湘向蒋介石请罪、叫苦，官损五千、兵折八万，此后“难乎为继”，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等兼各职。

二、红六军团西征（1934年8月—10月）

[1934年]

7月初 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敌人占领后，红六军团被敌人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地区的牛田和碧江州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艰险。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已开始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中央红军在苏区内战胜敌人已不可能。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7月23日给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第一步应到达湖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第二步到达新田、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新的苏区；第三步渡过湘江，向新化、溆浦两县间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络。并要求任弼时同志及部分党政干部随军行动。弼时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8月初 红六军团以独立第五团一部伪装军团主力在牛田、津洞一带活动，以该团另一部进至万安下东沙塘一带佯作东渡赣江，迷惑和牵制敌人。

8月7日 红六军团率第十七、第十八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在地方独立团的配合下，从衙前、五斗江之间通过敌人封锁线开始西征。这时，湘军第十五、第十六师尾追而来。11日红六军团到达湖南桂东县南之寨前圩，举行誓师大会进行战斗动员。

员，并宣布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肖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原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十七师辖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团；龙云任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政治委员，下辖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团。

9月1日 红六军团进到广西灌阳县境。

9月3日 红六军团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5日进占西延县城，即按中革军委电示在该地区转入暂时休整。

9月8日 中革军委补充训令指出……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要求六军团最少要于9月20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以后则转移到湘西北地域，并与红二军团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中革军委的补充训令主要意图是要六军团以积极行动牵制更多的敌人，直接配合即将突围的中央红军的行动。

10月24日 红六军团到达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亲自率领接应红六军团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26日红三、六军团于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召开胜利会师大会。

会师后红三军团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七师、第九师分别改编为第四、第六师，共约4400人；红六军团由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暂时编为三个团，共约3300人。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红二军团指挥部统一指挥。

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了转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并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

三、中央红军长征（1934—1935年）

[1934年]

9月上旬 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进攻已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才被迫放弃在苏区抵御敌人的计划，沿着红六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三军团、红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尔后实行反攻，以粉碎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

中革军委从9月8日起，开始部署战略转移。首先，要求红军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在战斗的间隙“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其次，命令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再次，要求把敌人占领县区的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军事部长改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

同时，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央决定接受“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建议，同其进行停火谈判。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说明中央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的罪行，并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进行会谈，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与此同时，地方党政各级机关按照中央的决定，加紧进行突围的准备。

9月19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取消了

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并规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

在中央红军加紧突围准备之时，国民党“围剿”军主力于9月26日发起总攻。其第三、第十、第五纵队共6个师向石城攻击，第八纵队向兴国攻击，第七纵队向古龙冈攻击，第四纵队向长汀攻击，南路军向会昌进逼，并拟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宁都。这时博古、李德却被敌人气势汹汹所吓倒，决定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对于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以及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虽然进行一些准备和部署，但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中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教育工作，对于战略转移没有思想准备或准备很不充分。

10月7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鄂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实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2个纵队，叶剑英、李维汉分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第一纵队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随第二纵队行动。以上两个纵队和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共8.6万余人，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前，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